

中国式现代化对民粹主义陷阱的跨越

户振亚^a，贾付强^b

(贵州师范大学 a. 马克思主义学院; b.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阳 550000)

摘要:近年来,民粹主义甚嚣尘上,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掉入民粹主义陷阱无法自拔,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深受民粹主义的袭扰,给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蒙上阴影。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走出的新道路,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回答了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跨越民粹主义陷阱这一时代之问,为那些正深受民粹主义困扰的国家和地区顺利走出泥潭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中“人的现代化”的价值旨归跨越了民粹主义的“人民观”陷阱,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跨越了民粹主义的“平等观”陷阱,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跨越了民粹主义的“民主观”陷阱。

关键词:民粹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 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2023)06-0046-08

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人民主体地位失衡,不平等现象愈发严重、民主政治制度异化、“逆全球化”思潮泛滥,诱发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甚嚣尘上。民粹主义具有利用、煽动“真正的人民”实现自身利益的“人民观”,主张“绝对平等”“杀富济贫”的“平等观”,主张“个人威权主义”“多数暴政”“政党斗争”的“民主观”。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文明形态的“灯塔”已被民粹主义的阴影笼罩,全球化进程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难以“独善其身”,迫切需要新的道路、方案和文明形态予以有效应对。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23-24},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价值旨归,努力消除发展中的绝对不平等因素,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明,是在“人民观”“平等观”“民主观”等维度对民粹主义陷阱的全面跨越。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无疑给世界上那些迫切希望跨越民粹主义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实现“人的现代化”对民粹主义“人民观”陷阱的跨越

民粹主义的惯用伎俩是打着“人民至上”的旗号混淆视听、煽动民众,企图将“现实的人”异化为“虚构的人”,编制出其语境中“真正的人民”这一概念,并将他们培养成自己的“利益垫脚石”,这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背道而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民是逻辑起点,人民是价值旨归”^[2],在现代化进程中处处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承继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这一鲜明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用“现实的人”“最广大人民”“历史的创造者”等理念有力驳斥了民粹主义“人民观”的奇谈谬论。

(一)“现实的人”驳斥“虚构的人”

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曾发出疑问,“为什么‘人民’在民粹主义者那里显得如此重要呢?”^{[3]124}民粹主义想要达到自身目的,需要一个能够被灵活使用的“人民”群体,“哪些是人民,哪些不是人民”^{[3]124}是民粹主义者的首要判断。但民粹主义“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研究”(19XKS0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马克思主义信仰建构研究”(21VSZ08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户振亚(1993—),男,山东菏泽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思潮; 贾付强(1978—),男,河南潢川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政治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研究方向: 中国外交、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用人民名义”的虚假本质决定了其只能依靠一个能够满足其要求的工具性的“虚构的人”。正如德国学者维尔纳·米勒所指出的，民粹主义是利用“纯属虚构的人民，对抗一群被视为腐败的，或其他方面道德低下的精英们的认识方式”^{[4]25}。当民粹主义的行动无法向最广大民众求助时，营造“虚构的人”便是民粹主义者自欺欺人的常用手段。民粹主义者善于将自己及其支持者整体同质化为一个抽象的“人民”概念。也就是说，“人民”的概念早已在民粹主义者的思维中定型，他们将一群躁动不安的乌合之众异化为能够为他们效劳的、丧失了现实独立性的“虚构人”，建构起一种非现实性虚假共同体。不管外界如何评论与质疑，他们仍然企图依靠着自认为的“人民”群体进行民粹主义的运动实践，妄图达成其政治意图。但无论是早年的俄国民粹主义、美国民粹主义、拉美福利民粹主义，还是欧洲左右翼共振的民粹主义，数次喧闹而无果的民粹主义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一群没有自我意识的、丧失主体性、被虚构的乌合之众只能在短期内表达诉求、发泄不满，难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产生重要作用。

不同于民粹主义对“人民”概念的界定，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现实的人”是兼具自然属性、阶级属性、社会属性和自我意识的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5]524}，“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5]525}。也就是说，“现实的人”是基于能动实践活动的人，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人，是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文明创造，是承继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人本逻辑”的新现代化道路，其视阈中的“人”既不是资本主义体系中被压迫剥削、丧失自我意识的人，亦不是被民粹主义所魅惑的“虚构的人”，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5]295}，每个“现实的人”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众人的合力推动着现代化进程。而现代化的成果也惠及到了每个“现实的人”，由人民共享。中国共产党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构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和本质要求，这既是对民粹主义“虚构的人”这一逻辑起点的驳斥，亦是对民粹主义“虚假共同体”幻想

的超越，更是对推动人类文明整体性变革的奔赴。

（二）“最广大人民”驳斥“真正的人民”

为达成自己反精英、反建制的目的，民粹主义将自己标榜为“人民的代表”，营造出“人民与非人民的对抗”舆论氛围并形成道德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宣称，他们而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4]8}。很显然，民粹主义宣称的“真正的人民”并不是全体最广大的人民，而是其有目的性的主观选择的“人民”。那么，在民粹主义语境中谁才是“真正的人民”？一是非异己人群。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有着特殊政治意图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必然有着其反对者、竞争对手和自身信徒，民粹主义者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和诉求，必然会将异己者排除在“真正的人民”行列之外，甚至不惜对其进行污名化和人身攻击。二是非社会最底层人员。民粹主义善于利用社会最底层人民做文章，但并不代表其真正为社会最底层人员服务。在他们眼中，社会最底层人民就像“寄生虫”一样需要依靠别人而生存，无法对其政治目的的达成提供任何帮助，甚至还会对其造成精力消耗。三是非特殊社会集团。民粹主义者“努力构造自身以区别于那些无组织的成分混杂的民众，它通过区别于一些特殊的社会集团”^{[3]127}，果断地将“移民、难民、失业者”等无法给他们提供实质帮助的特殊社会群体排除在“人民”的范畴之外。一如维尔纳·米勒所指，“民粹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把‘真正的人民’从实际生活在一国中的全体民众中割裂出去，进而把那些与民粹主义者持不同立场的公民排斥在外”^{[4]103}。可见，民粹主义是在努力主观构造一个道德化的观念，有选择地树立起“真正的人民”的代表身份。

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指明了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阐明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首次明确了“人的解放”的宏伟前景。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6]，不同于民粹主义所虚构、利用的“真正的人民”的形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22}，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得现代化进程面临前所未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更需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相信和依靠最广大人民，充分调动了人

民群众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中国式现代化符合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保证了全体人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不断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歧视、不放弃任何一个人民群众，树立起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鲜明旗帜。要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的先进文明形态，其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驳斥了民粹主义所吹嘘的、虚假的“真正的人民”概念。

（三）“历史的创造者”驳斥“利益的垫脚石”

如前所述，民粹主义异化“虚构的人”和选择“真正的人民”皆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是寻找自己的“利益垫脚石”。保罗·塔格特认为“民粹主义者运用人民的语言并非因为它表达了根深蒂固的主权在民的民主信念，而是因为‘人民’居于中心地位。”^{[3]128}回顾历史上的各次民粹主义运动，尽管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求助于人民”却是相同的手法。民粹主义具有煽动性，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需要运用易于变通的手段，“人民”概念的灵活性和易于拓展性就使其成为民粹主义利用的首要对象。只有打着人民的旗号，才能给民粹主义运动披上合理化的外衣，从而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正如美国学者约翰·朱迪斯所指出的“民粹党的目标是将多元的族群编入‘人民’这一概念之下，而联合‘人民’的就是使人民与精英产生意识形态对立的一系列需求。”^[7]换言之，民粹主义者之所以如此推崇“人民”，以“人民”的身份自居，以“人民”的名义来发声，只是把人民作为满足他们需求的工具。民粹主义者所歌颂的“人民”，是被剥夺了真实含义并被民粹主义者分离出特定的意义并加以利用的群体，他们已彻底沦为民粹主义的“利益垫脚石”。

马克思指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8]。人的物质生产、道德观念、文化创造等一系列活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这个基本规律中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人”。尽管每个现实的个体都有着一定的特殊性，但无数特殊的个体相互交织产生出一个合力，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合力作用的产物就是历史的结果。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创造的文明样态，秉承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基本原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1]70}中国共产党是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领路人，而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人民群众在从事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不断更新思想观念和实践方式，并不断掌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逐步完成了对自我的发展和历史的创造，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所结出的文明之果、走出的文明之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主体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群众史观基本原理有力驳斥了民粹主义将人民视为“利益垫脚石”的虚伪行径。

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民粹主义“平等观”陷阱的跨越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9]14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民粹主义生发背后的不平等诱因。而在对平等的追求中，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致力于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以弥合财富鸿沟，超越了民粹主义主张“绝对平等”“杀富济贫”的平等观，精神共同富裕有助于消解民粹主义“不平等”诱因背后的“群体情绪”。

（一）公平正义超越“绝对平等”

二战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欧美国家盛行，其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核心要义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但资本主义社会中固有的不平等现象及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弊端，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以美国为例，“美国民粹主义势力兴起的背后，是贫富差距问题”^[10]。《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显示，截止到2020年底，美国最富有的50人与最贫穷的1.65亿人拥有的财富相等，美国1%最富有的人拥有的净资产是50%最贫困人口16.4倍，且美国614位亿万富翁的集体净资产在疫情期间增加了9310亿美元^[11]。可见，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持续共振使资本高度集中在富人之手，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愈发明显，民粹主义开始泛起。然而，主

张“绝对平等”的民粹主义并没有真正解决不平等问题。不同于一般的平均主义，民粹主义“绝对平等”的主张更加激进。民粹主义试图基于绝对平等的理念，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制度的构建进行极致的简单化，将人民对平等的诉求异化为绝对平等。但对绝对平等的简单化追求无法触及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不平等的根源，民粹主义的“空想乌托邦”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真正能够指导消除不平等现象的实践方案。从俄国民粹主义到如今各个流派的民粹主义，大抵皆是如此。

共同富裕战略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更不是追求民粹式的绝对平等，而是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总体上解决绝对不平等现象。习近平指出：“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9][17]} 共同富裕战略强调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其内在蕴含和外显。一方面，共同富裕统筹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方面，避免陷入结果不平等的窘境。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同频共振，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带来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分好蛋糕”是对进一步“做大蛋糕”的激励，让更多的发展红利惠及人民，三大分配之间协调进行，缩小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改变结果不平等的情况，这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从而消除民粹主义生发的基础性根源。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可以缩小“区域、城乡、行业”之间的差距。共同富裕实现的主要方式之一便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以及行业收入差距，这将会解决大部分处于“劣势地位”民众的迫切需求，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不同群体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公平正义得以充分彰显。共同富裕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弥合“财富鸿沟”的过程，是先富带后富的动态发展过程，是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的过程，绝不是追求乌托邦式绝对平等的过程。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拒绝“杀富济贫”

《2021 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百万富翁总数已达到 5610 万人，占据全球总财富的 45.8%，最富有的 10% 人群拥有全球 82% 的财

富，最富有的 1% 人群拥有 45.8% 的财富，但处于财富金字塔底层 50% 的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占比不足 1%^[12]。如今，上下层民众之间财富增长率的严重不平等加速了社会分层与阶层固化，库兹涅茨倒 U 形曲线理论似乎不再成立，代际传递的“阶级诅咒”已不可避免，底层民众与精英阶层的距离愈发遥远，精英阶层资源占有越来越多，底层民众对精英阶层愈发不满，阶级对立情绪加剧，社会撕裂与疏离难以避免，民粹主义借机登堂入室。但民粹主义主张的“杀富济贫”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以美国民粹主义者休伊·朗发起的“分享财富”运动为例，运动的核心内容是向财富超过 500 万美元及收入超过 100 万美元的家庭征收所得税，用于其他家庭的“家庭资产”的置办，具有明显的“杀富济贫”色彩。尽管运动得到了部分社会底层的支持，缓解了公众对财富不平等的担忧，但更多受到了富人阶层的抵制和阻挠。加上其所征收的税收无法满足其所承诺的投入，运动实际上并没有根本改变美国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杀富济贫”式的民粹主义手段难以触及经济不平等的根源，这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积累理论有着天生的背反。富人本就不愿意拿出自己的财富分享给社会底层，一些象征性的慈善活动出于博取名声或迫于压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

相较而言，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是中国式现代化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共同富裕战略有效控制两极分化，推进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构合理社会结构，在不损害先富起来的人利益的基础上带后富、帮后富，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一方面，共同富裕战略主张“限高、扩中、提低”以建构合理社会结构。“限高”可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以遏制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保障机会平等。“扩中”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就业机会等措施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及其收入水平，提高其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促进消费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提低”可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和技能水平，激发其劳动潜力，畅通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流通渠道。可见，共同富裕战略保障了富人阶层的正当权益，又通过改进社会结构帮助穷人阶层走向富裕。另一

方面，共同富裕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习近平指出“当年一些国家搞民粹主义，高福利养了一批‘懒人’和不劳而获者，结果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不能自拔。”^{[9]210}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更不是“福利主义”，而是需要全体人民脚踏实地的共同奋斗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从而打破阶层分化和固化的“阶级诅咒”。

（三）精神共同富裕逐步消解不平等背后的“群体情绪”

“民粹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也是一个群体心理反应的结果。”^[13]从群体心理学角度来说，民粹主义是“大众人”的心理表达，是针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公、阶层分化等“不平等”问题所表达出的一种群体性情绪。民粹主义的惯用手段是采用“主观”眼光看待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社会动荡等社会矛盾，并归咎于社会精英对普通大众的疏离、社会上层占据了底层大量资源等原因。民粹主义善于抓住社会矛盾来调动大众的负面情绪，并对大众进行道德上的绑架。维尔纳·米勒认为“让民粹主义者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公然做出这些行为，并伴随着大众道德上的支撑。”^{[4]60}换言之，认识民粹主义也要看到其“不平等”诱因背后的群体情绪失衡。在民粹主义主观构建的群体圈群中，个体思维被群体性思维所束缚，破坏、极化与从众的心理状态展现了群体性利益诉求的表达。英国政治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认为“‘反个人’有感情而无思想、有冲动而无观点，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他的力量。”^[14]民粹主义不断加深群体性情绪，煽动大众采取“直接行动、直接发声”进行反抗，颠覆现有体制、破坏秩序规范。这在无意中给大众戴上了“心理枷锁”，“个体人”的消失与“大众人”的反叛是民粹主义群体心理的典型写照。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9]142}，共同富裕的进程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高度统一，最终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样，随着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不断推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断得到满足，群体性情绪亦会被逐步消解。一方面，高质量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整个国家及其人民在物质生活富裕、教育健全、文化先进的基础上形成的积极开

放的总体性心理状态^[15]。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高质量的文化服务为依托，通过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途径，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打造文化高地和思想阵地，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求，最终形成积极开放的社会心态，这正是纾解民粹主义背后破坏、从众、极化等群体性情绪的关键。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了辨别、抵御民粹主义的能力。共同富裕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便是精神共同富裕“人本逻辑”的最终价值旨趣，最重要的一环便是“满足人”，在精神领域而言是满足人的平等感、正义感、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等需求。当人民精神生活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时，其会认清民粹主义的奇谈谬论，认清民粹主义煽动群体情绪的“病变”本质，民众便难以被民粹主义的谬论所蛊惑，更不会从民粹主义吹嘘的“乌托邦”幻想中汲取精神慰藉。

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民粹主义“民主观”陷阱的跨越

当前愈发严重的经济不平异化了民主政治的平等观内核、破坏了政治体制运行规则，从而造成了政治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又为经济不平等提供了政策掌控力，“金钱政治”“身份政治”使得政治成了顶层精英阶层“少数人的游戏”，民主的逐步异化必然会引发中下层民众激进的政治抗争和民粹主义的泛起。但民粹主义民主观主张的“个人威权主义”“多数暴政”“政党斗争”内核并不能从根本上校正异化的民主。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集中统一领导”“有序参与”“政党合作”的理论实践彻底超越了民粹主义“民主观”。

（一）“集中统一领导”超越“个人威权主义”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和方式，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政治权力源于经济权力，经济权力决定政治权力”^[16]，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已经随着经济领域的严重不平等而逐渐失灵，“金钱政治”“身份政治”“精英政治”的出现早已异化了其设置本意。面目全非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逐渐丧失代表大众的民主本质规定，而向少数精英的统治偏离，并且渐趋“失去了连接精英与大众的功能，丧失了代表性，失去了对大众民意的回应性”^[17]，资本主义政党也沦为精英统治合法

化的工具。代表着大众在政治领域对精英进行实践抗争的、试图重新校正资本主义政党纽带作用的民粹主义趁机登场，但民粹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个人威权主义”色彩依然不具备民主真正的平等内涵。执政者采用民粹主义观点，很容易走向政治上的卡里斯玛式的领导，强烈的集权主义被深深嵌入民粹主义者的执政观念中。“伟大的个人魅力”随着不断的“权力集中化”与“个人化”，又极易走向“政治独裁”，这从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的政治实践中皆可见端倪。尽管“个人威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裂痕，促进了社会公正，缓解了社会危机，但它通常“以扩张而不是以重塑政治的本质而告终”^[3179]，依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走向异化的趋势。

相较而言，我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就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在于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1]23}，在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创造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有着鲜明特色。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7}，可以充分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大力支持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民主过程，确保国家机关的高效运转，从而有效避免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下党派相争、利益集团斗争的弊端；避免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只代表少数精英集团、忽视大众诉求的弊端；避免资本主义政党制度背后国家行政机构之间相互推诿、效率低下的弊端。相较于具有民粹色彩的“个人威权主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科学、权威、统一、团结、协调、高效，可以“充分彰显人民主体地位，使人民意志得到更好体现、人民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创造活力进一步激发”^[18]，这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保障，亦是对民粹式“个人威权主义”的全面超越。

（二）“有序参与”超越“多数暴政”

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中，财富占有指数必定影响到政治权力占有指数，金钱政治、政

治极化、身份政治等问题愈演愈烈，民主政治制度的功能性衰退，愈发背离制度设计的初衷，已彻底沦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少数人游戏”。这导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隔阂与分歧愈发严重，大众追求公平正义的诉求加深，这时民粹主义便会趁虚而入成为大众抗争的“合法性”表达，煽动早已对现行政治制度不满的中下层民众“揭竿而起”进行批判反抗与直接行动，渴望政治权力和参与发声的民众难免会为其背书，从而彻底动摇本就孱弱的政治体制运行的基础。民粹主义运动实践倾向于煽动民众进行直接行动并赋予其道德上的“合法性”。正如若泽·奥尔特加·加塞特所指出的“当大众在公共生活中压倒性的干预从偶然的、罕有的活动发展成为一种正当性行为时，‘直接行动’便成为公认的方法。”^[19]民粹主义试图利用大众的不满情绪对民主制度运行秩序进行颠覆，声称暴力行动是唯一的理性，形成“多数的暴政”压倒一切异己者。而民主制度本就存在着出现“多数暴政”的可能性，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曾指出“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20]这就造成了民粹主义所营造的“多数暴政”极易被民主制度下的固有缺陷所掩盖，使得中下层民众甘愿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相较而言，“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9]258}，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使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有着最完善的机制和最广泛的渠道参与管理国家事务，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一方面，人民群众有着广泛的诉求表达渠道。民意能否畅通表达是衡量民众民粹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我国人民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信访等多种途径来表达自身意志和诉求。另一方面，国家有着健全的民主管理机制。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基层自治组织、协商民主、听证制度等各种途径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民主决策与管理。可见，“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9]258}，其突出优势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生活的有序参与，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利，避免了资本主义民主被上层利益集团操弄的窘境，是对民粹主义挑唆“人民与精英对立”行径的强有力反击，与民粹

主义崇尚的“多数暴政”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多党合作”超越“政党斗争”

维尔纳·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无法摆脱的‘永恒的影子’，是一种‘源于民主世界的内部’的危险”^{[4]8}，“民粹主义随着代议制民主的出现而崛起，它是代议制民主的阴影”^{[4]26}。可见，民粹主义与代议制民主有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目前，西方代议制民主正在逐渐退化为由政党政治主导的弱竞争民主^[21]，在民粹主义者眼中，政党之间的相互斗争、相互掣肘、相互推诿大大降低了对民意诉求的解决，民主由政党政治主导无法真正代表民意，无法真正回应人民的实质性诉求。民粹主义站在政党政治的对立面，高举“反精英政治”的旗帜，试图代表建制派政党刻意忽视和边缘化的群体。换言之，“民粹主义者敌视代议制政治”^{[3]3}的一部分重要因素是敌视无法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党政治。但民粹主义在代议制政治环境中产生，又需要借助现行的政治制度开展活动，民粹主义政党的理论局限性使其无法摆脱政党斗争。民粹主义政党声称自己是公共利益唯一合法代表，加之其内部强烈的威权主义倾向，使其无法容忍不同的意见。民粹主义政党想要真正参与到政治治理中，就必须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关键途径就是对主要政党发起挑战和竞争。譬如，美国第一个民粹主义运动“人民党运动”，其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便是在与民主党、共和党的斗争中被两党联合压制。概而论之，民粹主义试图推广一套“民粹主义民主”的观念，试图规避掉政党政治的实践方式，但又无法真正摆脱需要政党斗争的现实。

相比之下，中国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了人类政治制度的新形态。习近平强调“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9]25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提倡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彻底规避了“政党斗争”的弊端，充分保证了人民权力的行使。一方面，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能够集中各个党派、各个领域、各个民族人民群众分散的意见，便于形成人民的整体性意志。通过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确保各个国家机关能够高效运转，及时有效地处理人民群众的各种意见、建议与诉

求，并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的意志，真正保障了人民权利，有效避免了西方代议制民主混乱失灵的困境。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彻底的、科学的人民性，是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制度保障，是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的新方法，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平等参与、充分行使国家权力，避免了西方代议制民主在相互掣肘中忽视民意的弊端，也避免了民粹主义利用民意诉求大做文章的可能。可以说，真正扎根于、成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先进政治文明无疑能够有效跨越西方政治制度下的“政党斗争”的弊端，避免民粹主义的羁绊。

结语

如今，民粹主义样态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逐步细化，如“国家民族主义民粹和排外民粹通过注入民族主义同质观创造或改写本国的历史观念”^[22]的右翼民粹主义复兴；质疑国际卫生组织权威、反对阻碍全球抗疫合作的全球性医学民粹主义冒头^[23]；迎合民众强烈环境关切，对抗全球环境治理合作的环境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形成^[24]。“单边主义、排除主义、民族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悖论盛行，加剧了国家和群体之间的政治冲突，急剧冲击着现行国际秩序，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严重的威胁，使得本就动荡的国际环境更加“雪上加霜”。当部分国家和地区在思考如何走出民粹主义泥潭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不断的探索中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在理论体系上同民粹主义悖论彻底划清界限，是能够跨越民粹主义陷阱的正确方案。尽管中国目前在全球性的民粹浪潮中仍无法“独善其身”，但随着人的现代化不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不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民粹主义对中国的诘难必会被纾解。而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亦会“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1]16}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盛玉雷.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22-10-16(05).
- [3] 保罗·塔格特. 民粹主义[M]. 袁明旭,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 [4] 维尔纳·米勒. 什么是民粹主义? [M]. 钱静远,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0.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4.
- [7] 约翰·朱迪斯. 民粹主义大爆炸[M]. 马霖, 译. 北京: 中信集团出版社, 2018: 144.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01.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10] 厉以宁, 黄奇帆, 刘世锦. 共同富裕: 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2: 92.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N]. 人民日报, 2021-03-25(10).
- [12] 张恒龙. 坚持普惠包容 实现共同发展[N]. 光明日报, 2022-11-15(05).
- [13] 林红. 民粹主义: 概念、理论与实证[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175.
- [14] 迈克尔·奥克肖特.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 张汝伦,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95.
- [15] 傅才武, 高为.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与指标体系[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 11-24.
- [16] 王沪宁. 政治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67.
- [17] 侯恩宾, 李济时. 西方民主制度的结构性不均衡与民粹主义的兴起[J]. 社会主义研究, 2019(3): 121-129.
-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民主》白皮书[EB/OL]. (2021-12-04) [2022-10-14].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44691/Document/1717212/1717212.htm>.
- [19] 若泽·奥尔特加·加塞特. 大众的反叛[M]. 马楠, 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20: 73.
- [20]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 上卷[M]. 董果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310.
- [21] 丁辉. 走向“弱竞争民主”: 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嬗变与代议制民主的危机[J]. 国际政治研究, 2022, 43(4): 49-72+6.
- [22] 露丝·沃达克. 恐惧的政治: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话语分析[M]. 杨敏,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57.
- [23] 聂长久. 全球性医学民粹主义的兴起、影响与应对[J]. 北京社会科学, 2022(9): 4-11.
- [24] 王红艳. 环境民粹主义在欧盛行的原因及其政治影响[J]. 当代世界, 2021(9): 56-61.

【责任编辑: 未央】